

支，还有整墙的羚羊群。她应该解释说她很容易就哭，他没必要神情紧张。他尴尬地问道，“你为什么哭啊？”他不知道，他不会明白。他全弄错了，这些当不了替代品……

“在博物馆里，他们撒谎。”她说，“别信他们的。那都是错的。那不是丛林和羚羊，那是人。我们也有电脑和汽车。在非洲我们有七喜，有些人，极少数的一些人，还有带镀金水龙头的浴室……我不应该和你坐在这儿。你也不应该跟我说话……”

他说，“博物馆会变，我也能变……”

他不知道那是一条她不敢去走的艰辛路。他不明白。许多事物，岁月和风景，还有鸿沟。如果她够强大，她应该去解释而不是懒于解释。她可以耐心地教他另一种语言，她们的字母拐来扭去就像他从数学里学到的艾普斯龙和伽马。她可以告诉他文字也能从右往左读。如果她在博物馆里不是这么渺小，如果她真的足够强大，她可以让他到麦加的旅行变成真，而不仅仅是在一本书里。



等待

(尼日利亚) E. C. 奥桑杜 刘雪岚译

E. C. 奥桑杜 (E. C. Osondu) 出生并成长于非洲最具文学传统和文学成就的国家：尼日利亚。从这里走出过诺奖得主索因卡和著名小说家阿契贝，如今尼日利亚依然是盛产作家的国度。奥桑

杜曾作为广告文案员在家乡工作，后赴美留学纽约的雪城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并于2008年留校任教。自2010年起，他任教于长岛的普维敦斯学院，讲授“创意写作”、“文学概论”和“西方文明发展史”等课程。就像多数非洲作家一样，非洲经验也成为奥桑杜创作的最大源泉。他于2006年发表的书信体小说《家乡来信》以妈妈的口吻叙述，不断跟移民的儿子对话、质询，深刻地反映出非洲的现实及人的困顿，还被评为年度最佳十篇网络小说之一。2008年的《等待》(Waiting)讲述了难民营里的一群孩子，没有姓名和家人，全凭慈善捐赠的T恤上的字来充当临时姓名。他们在缺吃少水的情况下还在充满想象和期待地等待来自西方的家庭能收养自己。《等待》为奥桑杜带来了有“非洲布克奖”之称的凯恩非洲文学奖，还有一个月包吃住乔治城大学访问计划。奥桑杜的小说轻松灵动，不仅颇具幽默感，还有突出的音乐性。他2015年发表的新作《此宅不售》，融欢快与伤感于一体，并带着迷人的节奏和乐感。他曾对记者说，每当他创作某些特殊段落时，格言或谚语总是应声而至，令他发笑，他最喜欢的一句是“人不能因为太阳没点着雪茄就跟它怄气”。

译者

我叫奥兰多·扎基。奥兰多就是佛罗里达的奥兰多，这名字印在红十字会发给我的T恤衫上。扎基是我被发现的那个小镇的名字，我就是从那儿被带到这个难民营的。我在难民营的朋友们也都是根据他们T恤衫上的字被起的名字。阿卡普尔科穿的T恤

上就写着“阿卡普尔科”。“性感妞”的T恤上印着“告诉我，我很性感”。“巴黎”的T恤上说“朝见巴黎昔可死”。每次她走过来，我都闭上眼睛，因为我可不想死。

哪怕有谁后来得到新T恤，你最早的旧名字还是跟着你。“巴黎”分到一件新T恤，上面说“问我关于耶稣的事”，可我们还是管她叫“巴黎”，不会叫她任何别的名字。营里以前有过一个女孩，她穿的T恤上印着“有牛奶吗？”她把那件T恤扔了，因为营里有几个男孩老是使劲儿地挤她的胸，看看有没有奶。你没法知道你的T恤上会写啥。我们每次都是打啊抢的，能逮着一件就够幸运了。就拿“破烂鬼”来说吧，他得到的T恤上写着“我爸去了黄石公园给我搞来这件破T恤”。他不会打架，所以从到难民营起就一直穿着那件T恤衫，再没得着第二件。现在他衣服上的字都看不清了，那名字却再也去不掉。有些人运气好，“伦敦”的T恤上印着伦敦，他现在还真在伦敦。他是被那儿的一家人收养的。或许我也能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找到一家人，愿意收养我。

是诺拉修女让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她说忘却的最好方法就是记忆，记忆的最好方法就是忘却。诺拉修女就是这样说话的，绕圈说。我想因为她是个高级别的修女，说话就喜欢隐晦有寓意，像耶稣一样。就是她让我读书，还说我有讲故事的天赋，所以她觉得我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作家。

诺拉修女给我的第一本书是《等待戈多》。她说书里面的人就是在等待上帝来帮助他们。在难民营，我们也是等待、等待、再等待。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干的事儿。我们等待运食物的卡车来，然后排成直线，然后等着解散，然后等着争抢，然后我们就开始打斗、踢咬、撕扯、四散。接着我们再望着大路，等着送水车来。

看见远处尘土扬起，我们就跑回去，拿上装水的容器，等着卡车来。等到前面几个人装满水，我们又开始打斗、撕扯，因为有人悄声说水箱里的水不多了。这还是我们运气好，有水车来送水。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拿着装水的容器，一边等待着、一边祈祷老天能下场雨。

今天，我们是在等待摄影师来给我们拍照。红十字会的人会把我们的照片寄到国外，国外红十字会的再把我们的照片拿给各种外国人看，看过以后，那些外国家庭就会挑选他们喜欢的孩子，去跟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等那个摄影师都等了三星期了，不过他还要穿越交战区，所以今天也不一定能来。就是拍完照片，我们也要等他打印好再送回来。然后我们可以把照片交给红十字会的人，然后开始等待从国外传回来的消息。

我想去大树下找我的朋友了，那是仍然立在难民营里的唯一的一棵树。阿卡普尔科往空中扔了一把红色的沙土，看看有没有风；空气闷热，红土直直地落了下来。

“奥兰多，你觉得摄影师今天会来吗？”他问我。

“也许他能来。”

“你觉得有美国家庭会收养我吗？”

“也许吧，如果你运气好。”

“他们能治好我尿床吗？”

“在美国，每种病都有一种药片能治。”

“我没病，我就是睡着了尿床，因为我老是梦见我在外面撒尿，等我醒了，裤子就湿了，因为那就是个梦，可撒尿是真的。”

“你每晚都做同样的梦？”

“是呢。”

“你觉得是不是我要去了美国，我爸爸妈妈就会知道，会给我写信，我也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我的新家庭在哪，让他们到美国来跟我在一起？”

“等战争结束了，你爸你妈就能找到你了。”

“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我也不知道，不过很快会结束的。”

“如果战争很快要结束，红十字会的人为啥还要把我们送到美国去？”

“因为他们不愿意我们参加青年旅，不愿意看我们不去上学，却跑去杀人放火、抢掠偷奸，最后毁灭、战死。”

这就是为什么阿卡普尔科总是孤零零地坐在树下：因为他老是问好多问题。诺拉修女说问问题是好的，如果你提问题，就永远不会迷失。阿卡普尔科又开始扔土，看看有没有风。他的耳朵开始流脓，这让他总是带股臭鸡蛋味儿。这是人们躲开他的另一个原因。一只苍蝇围着他的耳朵嗡嗡飞；他起初不理睬，等到苍蝇要落的时候，他就使劲儿地轰走了它。

“我希望能养只狗，”他说。

“你要狗干什么呢？”

“我想在送去美国的照片里跟狗一起合影，因为白人喜欢狗。”

“可他们也喜欢人。”

“是的，但他们喜欢爱狗的人。”

“伦敦也没有跟狗合照啊。”

“是啊，伦敦现在在伦敦。”

“也许你很快就能去阿卡普尔科了，”我笑着说。

“阿卡普尔科在哪里啊？”

“他们那儿有大海，又蓝又漂亮。”

“我不喜欢大海，我不会游泳，我就想去美国。”

“在美国所有人都会游泳；所有的房子都有游泳池。”

“我愿意在游泳池里游泳，不喜欢在海里。我听说游泳池的水又甜又干净还是蓝色的，对皮肤也好。”

我俩不说话了。我们能听见铝板做的房屋发出声响。就像小子弹粒发射时发出的怒吼。房子上用的柏油帆布和塑料布在微风中拍动，就像一千只塑料风筝迎风飞起。阿卡普尔科又向空中扔了一把土。风把土吹走了。有些土刮到我们脸上，阿卡普尔科笑了。

“上帝没有睡着，”他说。我没有搭话。

“以前营里是有几条狗的。”他比我来的早。他是难民营里待得最久的几个之一。

以前有好多只黑狗。都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保护者。就是食物短缺的时候，狗也从没挨过饿。一有小孩儿蹲下拉屎，女人们就会吆喝狗过去。那些狗就会等小孩拉完屎，先把孩子屁股舔干净，再去吃屎。人们也会给狗扔些食物残渣。狗还有其他的用处。那阵子，敌人还会频繁地袭击营地。我们都会躲在一个洞里，那些狗会收集树叶和其他东西，铺在我们藏身的洞口上。敌人经过洞口就不会发现我们躲在里面。

但有一阵，红十字会连着两星期都没能给营地送食物，因为敌人不让他们的飞机降落。我们实在太饿了，就杀了几只狗做了胡椒汤。几天之后，红十字的人可以通行，就送来了食物。那些狗开始有些警觉，不过它们似乎也明白，那不是我们的错。

后来，接着第二次，又有很长时间没有食物。这次我们只捉

到了几只狗，有一些在我们抓捕的时候逃掉了，但我们还是抓到几只，杀了，吃了。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看到那些狗；那些逃跑的狗也难以接近。有一天，一个小孩儿要蹲下拉屎。等他妈妈抬头时，发现曾经消失的六七条狗突然出现，袭击了那个孩子。那个妈妈尖叫着，狗把孩子撕成碎片，用嘴叼着跑了。男人们后来埋伏袭击了狗群，杀了几只狗。他们说狗已经变得跟狮子一样凶猛。我们没再看见狗。人们说这也是战争。

我打算去问诺拉修女。就像读懂我的心思一样，阿卡普尔科告诉我不要跟任何人提这件事。他说难民营里的人不喜欢谈论狗的事儿。

“我不确定摄影师今天会不会来，”我说。

“有时候我觉得我脑袋里有颗子弹，”阿卡普尔科说。

“如果你脑袋里有颗子弹，你早就死了。”

“它是从我这只坏耳朵进去的。我能听见脑袋里有爆炸声，子弹砰砰响，有声音尖叫，班扎^①，班扎杂种，你快出来，我们今天要喝你的血，接着我就闻到碳味，硝烟味，茅屋着火的味。我不喜欢女人们烧柴做饭的烟火味；那会让我脑袋里的子弹开始乱飞。”

“你到了美国就好了。他们不用柴火做饭；他们用电。”

“你啥都知道，扎基。你也没去过这些地方，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读了很多书，书里有很多知识，有时候还讲故事呢，”我说。

^① 班扎，原文为 banza，意即“杂种”。

“我不喜欢没有图画的书；我喜欢有大大的、漂亮的、花花绿绿图画的书。”

“不是所有的书都有图画啊。只有给小孩儿看的书才有图画。”

“我不想再照相，送给国外家庭，都没人要。现在差不多所有跟我一起到难民营的人都找到家庭，都在国外生活了。我有个朋友从一个叫达科他的地方给我来信了。为什么没有家庭收养我？你觉得是他们不喜欢我的长相吗？”

“就是运气；你的运气还没来呢。”

“有时候我真想去参加青年旅，可我又害怕；听说他们给人抽大麻，他们还喝血发誓，对谁都不留情，包括自己的父母。”

“如果听到你这么说，诺拉修女会生气的。你知道她在尽力帮咱们，红十字会的人也是，他们在努力给你找个领养家庭。”

“那个叫达科他的地方一定到处是岩石吧？”

“为什么这么说？”

“就听这个发音啊，好像很多大石头同时滚落下来。”

“我想去个有天使的地方。”

“你是说洛杉矶吧。”

“他们杀了我们好多人，就因为那些人不能准确念出叛军首领的名字，他们说我们念不出‘Tsofo’，我们一直念成‘Tofo’，他们就一直开枪杀我们。这个难民营里有个朋友，他教我说‘Tsofo’。他说我要像嘴里含着沙子那样就能念出来了。就像舌头上有沙粒。现在我两种都能念。”

“那好啊。等你到了美国，你也要学他们说话。你每说一个词，就得像把舌头吞下去，你要说‘larer’，‘berrer’，‘merre’，‘ferre’，‘herrer’。”

“我们走吧，要吃午饭了。”

“我没力气打架了。每次要吃饭，我都害怕。要是我妈在，我就不会无家可归。妈妈会做饭给我吃，我不用每次吃饭都要打架。”

我俩一起抬头看着那些棚屋顶上升起的缭绕的炊烟，有些女人在那里做达瓦^①饭。你能分辨出哪些人是有妈妈的，因为一到下午他们的棚屋总会升起炊烟。我不知道阿卡普尔科和我还能不能找到收养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无家可归也没有家人。多数出国的人都是有家庭的。我没跟阿卡普尔科提到这一点；我不愿意让他又想起他那不会念“Tsofo”的父母。我有次听到难民营里有个人说如果上帝想让我们说“Tsofo”，他就会赐予我们能发这个音的舌头。

“跟我来，我去帮你抢食物，”我对阿卡普尔科说。

“你不用打架，奥兰多。所有的孩子都尊敬你，他们说你谁都不怕啥也不怕他们说诺拉修女喜欢你他们说你有本书你把人们做的所有坏事都记录下来交给诺拉修女看当你俩一起读那本书的时候你们就一起摇头晃脑地大笑就像就像丈夫和妻子。”

我们站起身，向吃午饭的瓦楞板棚屋走去。我能闻到达瓦的味道，万年不变的达瓦，不变的绿蝇，不变的弯曲打卷的铝盘子，可我们还是要争抢才有得吃。

“和服”最先看见我，开始招呼我，接着就来了阿鲁巴、耶路撒冷、“破烂鬼”、“我就喜欢”、马略卡，和其他所有的人。大厨站在盛着达瓦饼和青汤的盘子前。她的脸上有种神情，就像一个男人即将看到两个漂亮女人在他面前大打出手，互相撕扯得赤身

① Dawa，是一种被普遍用在一些非洲食物中的原料，似豆类，常做成面糊或面饼。

裸体一样。她对我们摇着手指说：小子们，今天不许打架。可这是宣布动手的信号；我们一拥而上。达瓦和汤溅得满地都是。有些人一边抢盘子一边往嘴里塞东西，免得抢到最后啥吃的也没捞着。我抢到一块儿达瓦，扔给阿卡普尔科，正准备伸手去抢一盘子汤，“破烂鬼”一脚踢飞了盘子，汤洒了满地。他发出像土狼一样的疯狂笑声，嘶嘶叫着说：这个麻风病可能不会挤牛奶，可他肯定知道怎么倒奶桶。大厨不停地尖叫着，嘿，别抢了，一个一个排好队，达瓦饼每个人都够吃。我拿到一盘洒了一半的汤，一边示意阿卡普尔科往外走，一边向外挤。我俩蹲在棚屋后面，一边用手指蘸着汤，一边用另一只手轰着大苍蝇，我们有两块硬邦邦的达瓦饼，还有一点汤。我吃了几口，把手在短裤上蹭了蹭，就把剩下的都给了阿卡普尔科。他正费劲地轰着食物上的苍蝇，还要赶走那只烂耳朵边的苍蝇，他用眼神向我表达了感谢。

我还记得诺拉修女有一次给我看过一本书，讲的是在过去的英格兰，有个穷孩子，跟他的厨子要更多吃的。从书上那男孩的画像来看，他并不穷。那本书里的男孩子们都有外套穿，有帽子戴，甚至还有人给他们盛饭。可我们却要抢。如果你跟厨子要更多吃的，她会指着洒在地上的达瓦和汤，说我们就愿意浪费食物。我有一次跟诺拉修女说过争抢食物的事，但她说她不想卷到里面。那是我头一回看到她拒绝去解决问题。她解释说她不为红十字会工作，她跟我一样也是他们的客人。

我在琢磨怎么才能摆脱阿卡普尔科。我需要独自待会儿，但我也不想伤害他的感情。我告诉他把盘子送回吃饭的棚屋。盘子不用洗，因为已经被我们舔得干干净净了。

当阿克普尔科去棚屋送盘子的时候，我悄悄地溜走了。